

怀念侯灿先生

孟宪实



侯先生治学，以新疆考古为主，但不是所有新疆考古问题都研究，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深耕。侯先生的学术，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，其次是楼兰，第三是和田。侯先生常说：做学问最怕没有资料，无米下锅，神仙也没用。



1988年12月5日，侯灿先生出席朝阳新闻在日本东京举行的“谜和传奇的古代国家——楼兰特别报告会”。

朝日新闻
松村崇夫摄

先生每天都要为我开课。当时，外面的喧嚣还没有平静，我跟侯先生的学习却大有进展。1989年9月，我草成第一篇吐鲁番的论文，讨论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的时候，侯先生跟我一样高兴。从此，我开始拥有自己的学术及生活。到如今，研究吐鲁番文书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，回想最初的感受，无一不是从侯先生开始的。把所有的同类文书抄写在一起，把所有的研究观点排列到一起，分析他们各自的根据与不足；

机会越来越少。有的时候，比如正在看书，忽然会听见侯先生的声音从身体很深的地方涌出：“小孟啊！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我都会猛然停顿下来，迅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耳提面命的效果，多年不忘。

侯先生治学，以新疆考古为主，但不是所有新疆考古问题都研究，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深耕。侯先生的学术，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，其次是楼兰，第三是和田。侯先生常说：做学问最怕没有资料，无米下锅，神仙也没用。新疆的考古资料，当然以吐鲁番出土最为丰富，不仅有大量的纸文书，还有可观的墓表、墓志资料。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，历次考古资料都比较容易找到。资料以中国保存为主，这一点几乎只有吐鲁番考古如此，因为解放后吐鲁番的考古资料，明显比解放前的资料要丰富。加之，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获资料也在国内，所以吐鲁番资料比较容易获得。侯先生有这样的思路，老一代学者都能理解。研究敦煌吐鲁番学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大陆学者严重受限，主要就是很难接触到国外的相关资料。侯先生没有参与过吐鲁番考古发掘，所以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进行历史研究。利用文物资料，侯先生研究高昌王国的郡县问题，讨论各个时期的高昌所奉年号问题，特别是利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的墓表资料，排检分析，写出《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》巨文（1984年），对于高昌官员几个系列和等级进行了详实的考证，即便今天也必须参考。吐鲁番资料，侯先生用功最多的应该是墓表资料。1990年，侯先生著《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》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

每当想起侯灿先生，心中就不免愧疚上升。得知侯先生生病的消息并不晚，但并不认为有多严重。有一次跟侯先生通话，音容笑貌宛如眼前，心想看来侯老师的病是好转了。后来让夫人专程前往上海看望侯先生，我自己竟然没有去。现在想起来，最后一次见侯先生，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侯先生去日本讲学经过北京，荣新江、姚崇新和我一起跟侯先生见面，还在北大门口照相，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。2016年9月，侯灿先生去世了，享年八十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吴美琳老师才打来电话告知，当时手握电话，全然不知道说什么，好像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。其实，当时的情绪被悔恨塞满：这么多年，怎么竟然没有去看过侯老师……

最后一次接到侯先生的电话，是来问《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》出版的事，时间大约是在2016年的春天。现在知道了，侯老师平缓的声音中，隐藏着极度的焦虑。他真地想在生前看到这部书出版，很有可能他对病情的好转已经放弃了希望。我尽力给先生以肯定的回答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把握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过去出版一套“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”，

学术影响不错，以侯灿先生的研究声望，他的文集加入这套丛书，一定能增光添色。其实，这套丛书当时可能已经夭折，但我并不知情。我知道国学院的人事变动会影响此书，主持者说人大出版社人事变动巨大，极大地影响了这套书的出版。侯灿先生的文集，是以手稿的方式寄来的，我更担心的是，交给出版社的书稿好几年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千万不要把手稿弄丢了。最终，书稿并没丢，五年过去了，就如同交出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书稿还装在侯先生用来邮寄的那个纸盒之中。但侯先生却注定再也看不到了。我自己固然大言不惭，是不是努力不够啊，这是无尽的愧疚之源。

侯灿先生是四川合川人，曾当过四年兵，然后进入川大考古专业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农一师的宣传科，十二年后才回归专业，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。1987年，从新疆考古所调入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。我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，早就知道侯先生。当时新疆考古已经很吸引人，吐鲁番文书、楼兰考古等等，极具社会影响力。我们这些考古门外人，都知道新疆考古学家的大名。新疆师大是个年

轻的学校，师资力量除了高校新分配来的以外，主要来自中学和行政单位。如侯先生这样研究成果众多的学者，大家其实很少接触。特别是侯先生曾经是楼兰考古的领队，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，在人们的想象和讲述中，侯先生个人都充满神秘色彩。

侯先生调到师大历史系，我是第一受益人。这不是当时的认识，这是事后的总结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继续爱好中国思想史，1987年考上南开大学，但研究生不让读，对我的思想史研究也有冲击。思想史毕竟以社会为思考对象，社会史更能说明历史问题。我的唯物主义思维，促使我寻找社会史的问题进行思考。吐鲁番出土文书，就在这个背景下进入我的视野。出土文书，没有经过别人的改动，百分百地反映社会现实，从文书入手，最有利于社会史的研究。这种简单的思考，浮于问题的表面，完全是言不及义。就在这时，侯先生来到身边，如同天使降临，侯灿先生成为我请教的老师。研究吐鲁番文书要从哪些书入手，怎么获得研究资料，所有基础性的问题，都来自侯先生的教诲。我几乎天天要到侯先生家请教，侯

把墓表资料按时间编排起来，看看哪些官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，尤其官员的晋升，观察是否有规律可循。时间长了，很多镜头都变得模糊，依稀仿佛回望到我自己躺在床上排比墓表，或者是我看见侯先生在自己的床上排比……每有一个想法，总希望得到侯先生的赞成，每次获得赞成，就如同小学生一样高兴，觉得这一天没白过。

侯先生的家与我家是两个相邻的居民楼，从我家的阳台上能够看到侯先生家的厨房灯光。侯先生的夫人吴美琳老师，原是上海知青，先后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当老师。侯先生的家总是一尘不染、窗明几净。在沙发边上的一个小桌上，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搪瓷小盆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黄底红花的搪瓷盆。每次喝茶的时候，吴老师就笑眯眯地打开小盆：“小孟，选一块。”里面有各式糕点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来，都觉得十分美好。

侯先生的四川口音始终如一，每次要强调什么的时候，侯先生就会先说“小孟啊！”声音有些尖锐。这时，我的所有思绪会突然停顿，头脑里只剩下侯先生的一个声音。后来从新疆出来读书，听到侯先生教诲的